

王文治批点本《灵岩山人诗集》的文献价值

杨 煮

毕沅是清代乾嘉诗坛的代表人物，虽然仕至显贵，位高权重，偏嗜风雅，不废吟咏，其毕生诗作主要保存在《灵岩山人诗集》四十卷之中。现存《灵岩山人诗集》有嘉庆四年毕氏经训堂刻本（以下简称刻本），据卷前王文治序云：

余束发即学为诗，在京师交游跌宕，靡所不至，而于诗独深自韬晦，故与山人昕夕聚首，亦未尝深言诗也。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余访山人于武昌督署，始获受山人之诗而尽读之。……山人之以诗称，及余与山人交，皆三十年以前事。迄于今，年皆六十馀矣，始能徐徐然尽出所为诗，以相质证。然则山人之所以自待，与所以待其友者何如？深且远耶！^①

毕沅与王文治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科进士，三十年来交谊深厚，相知至契，彼此酬赠的作品极多。因而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毕沅将诗作付梓之前，特地约请王文治对其诗作稿本加以评阅。王文治曾有《以素心蕙草一枝赠灵岩山人而系以诗》记其事云：“天街并马少年游，弹指之间两百头。相逢各出销魂句，花雨帘前对校讎。”^②王氏当日手批原本已佚，但存世有两种过录本，略述如下。

第一种过录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分订上、下两册，装订时上、下册封面在先后顺序上出现错置。封面题“灵岩山人诗集上册（或下册）贞居藏”。上册扉页题“灵岩山人诗集 禹卿王太史朱笔原评 邑后学邵贞久珍藏”，下册扉页题“灵岩山人诗集 梦楼先生原评 邑后学邵贞久珍藏”，均钤有“贞久欢喜”朱文印。下册卷末另有识语两条，其一云：“庚戌春正月廿二日读起，至三月晦日读竟。丹徒王文治记。”并钤有“文治”白文印；其二云：“宣统庚戌六月十九日邑后学周樾读。”上下册末均钤有“邵贞久读书画记”朱文印。正文部分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下署“青箱书屋”。全书按集抄录，并不分卷，各集名称与后来的四十卷刊行本略有出入，上册为《青琐吟香集》、《阆风集》、《听雨楼存

①参见王文治《灵岩山人诗集序》，载《灵岩山人诗集》卷首，嘉庆四年毕氏经训堂刻本。本文引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均据此本，以下不一一说明。

②《梦楼诗集》卷十九《后楚游草》。本文引王文治《梦楼诗集》均据乾隆六十年食旧堂刻本，以下不一一说明。

稿》、《萍心漫草》、《商弦写忆集》，下册为《商弦写忆集》、《华岳寥莲集》、《持节青门集》、《持节青门续集》、《梁园吟稿》、《江汉扣舷集》、《香草集》。行间及天头经朱笔圈点批注，详审字迹，似非出自王文治亲笔。不过卷末识语所述“庚戌春正月廿二日读起，至三月晦日读竟”，与刻本卷首王氏序中所说“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余访山人于武昌督署，始获受山人之诗而尽读之”云云完全吻合，可见此批点本非出伪托，而是后人由王氏手批原本转录而来。

第二种过录本由今人瞿冕良先生收藏，他曾撰《灵岩山人集外诗——记抄本王文治评〈灵岩山人诗集〉》予以介绍^①，现据该文略作说明。该本曾经瞿冕良先生之父重加装订为一册，并手题眉签，原貌如何已不可知。正文部分半页八行，行十六至十八字不等，版心下署“杏雨草堂”。全书按集抄录，各集名目与上述第一种过录本相同，而又增出《乐游联唱集》、《陇头吟》两集。书中亦有朱笔圈点，最末部分略有缺损。

从种种迹象来看，两种批点本（以下分别简称“青箱书屋本”和“杏雨草堂本”）似乎先后由同一人抄录完成：首先，两者版心所署“青箱书屋”与“杏雨草堂”自然成对，很有可能都是某一人的书斋名号；其次，两者录诗的内容及所过录的王文治批语全无重合之处，尤其是有一组《陆叔平写生花卉十首》（收入刻本卷二十四），杏雨草堂本在抄录这组诗时阙其中《老少年》一首，而青箱书屋本则仅录《老少年》一首，题下并有小注：“陆叔平写生。”如果不是由同一人抄录，恐怕没有如此巧合的事情；最后，青箱书屋本中《祈雨纪事》诗“寿亭遗象肃禋祀”句有批语云：“‘寿亭’误称，详见《玉泉山》诗。”^②而在此本中并无《玉泉山》一诗及相关批语，反倒是在杏雨草堂本中录有《玉泉山》诗，并有批语云：“‘寿亭’改‘关公’何如？‘汉寿’地名，‘亭侯’爵名，‘寿亭’两字连称，乃《衍义》^③之讹。”^④两条批语彼此对应，唯一的可能应该就是抄录者先行在某一本中抄录了某一诗及其批语，后来发现漏钞了相关另一首诗及其批语，便在另一本中加以补钞。当然，这两种批点本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青箱书屋”和“杏雨草堂”是否就是前面提及的邵贞久的书斋名号？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⑤。不过将这两种钞本和后来刊刻的四十卷本《灵岩山人诗集》详加比对，对毕沅编订诗集的过程、修改诗作的情况都可以有较为直

①瞿冕良《灵岩山人集外诗——记抄本王文治评〈灵岩山人诗集〉》，载钱仲联主编、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②本文引青箱书屋本内容均据南京图书馆藏本，以下不一一说明。

③“衍义”当即“演义”，指《三国演义》。

④本文引杏雨草堂本内容均据瞿冕良《灵岩山人集外诗——记抄本王文治评〈灵岩山人诗集〉》一文，以下不一一说明。

⑤据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刻本《王文肃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6 册影印）有“青箱书屋”等印记，两者是否为同一人书斋号，尚待详考。

观的认识。

毕沅诗歌存稿最早始于乾隆九年(1744)其十五岁时,诗集中有《杨编修文叔绳武先生索观近制为评点奖借倍至即座赋呈》云:“绿衣隅侍最情亲,光霁襟期似饮醇。”又《删诗》云:“小坐严删旧日诗,个中得失寸心知。”《环香吟阁遣怀》云:“自改新诗编甲子。”可知其诗作不仅早就得到前辈文士的指点,自己也时常会加以润色和删订,并按时间先后予以编录。这些逐年编订的诗集很早就开始在师友之间流传,如袁枚曾提及毕沅“诗编三十二卷,曰《灵岩山人诗集》”^①;另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所述,曾有“《灵岩山人诗》三十六卷,门人嘉兴王复刻于偃师”^②,但这些都因无实物留存,详情已无从查考。王文治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获读的毕氏诗集稿本应当也属于这一类型。

据毕沅自述,乾隆五十八年,即在王文治批阅其诗集稿本三年之后,他又重新编订自己的作品^③,“搜箧中剩稿,编成《灵岩山人集》三十九卷,又《联句》一卷,共四十卷”;乾隆五十九年时又将所作“续编一集,为《绘声漫稿》”(均见《再题一首并序》);之后另有《海岱骖鸾集》,两者合编为一卷,随即取代了原先的《联句》一卷,接续前三十九卷,成为现在所见到的四十卷本《灵岩山人诗集》^④。不过原先提及的“《联句》一卷”在后来的四十卷定本中并未保留,其内容到底如何,颇令人猜疑。而这个问题,通过批点本就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答。

瞿冕良先生在其文中提到在杏雨草堂本所录诗中“还有一部分在刻本中是没有的,如其中《商弦写忆集》(据内容,系悼亡杂作)、《乐游联唱集》(均系与友朋即景联句之作),四十卷中既无此二种集名,其细目也基本上均未收载过(刻本中仅有《商弦写忆集》中的最后一首)。此外尚有《移居》、《宿愿》等三十题四十六首,也是刻本中未曾发表或被删掉的”^⑤。此说略有失考之处,盖《乐游联唱集》并非毕氏集外散佚之作,而是他和诸多幕宾合撰的联句诗集,今存有乾隆四十七年西安节署单刻本,所收内容与瞿先生文中所列完全相同。不过从杏雨草堂本的录诗情况倒是可以推知王文治当日看到的毕沅诗集稿本是包括《乐游联唱集》一类联句诗的。毕沅在编辑诗集时所说的“《联句》

①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②王昶等纂修《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八《人物》,嘉庆七年刻本。

③参见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三十九《行年六十有四诗集编成因题长句并柬知音》:“陶铸江山泄秘奇,新编四十九年诗。”

④《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八《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毕沅有《文集》四十卷、《诗集》二十卷,当有错讹。

⑤瞿冕良《灵岩山人集外诗——记抄本王文治评〈灵岩山人诗集〉》,载钱仲联主编、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第226页。

一卷”应当就是指以《乐游联唱集》为主要内容的联句诗而言。他在最终定稿时将联句诗剔除在外，或许是因为《乐游联唱集》在之前已有单行本，其馀的联句诗数量又不多（虽然毕氏联句诗并不仅仅限于《乐游联唱集》，但后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①），而且联句的性质和个人创作毕竟有别，所以才最终决定加以删除的。

虽然瞿冕良先生所述杏雨草堂本所存毕沅集外佚诗的数量并不完全准确，但统计两种批点本，仍然保留了不少四十卷本《灵岩山人诗集》未予收录的作品，共计四十五题七十五首。这些集外诗除了能更全面地展现毕沅的创作风貌，对于考察其编订诗集的过程也颇有助益。

毕沅在编订诗集过程中，往往会对一些不太满意的作品加以删除。若非将批点本与刻本对勘，有些情况是很难发现的，例如杏雨草堂本录有《和童梧冈无题四首》，其中第三首云：“吴山回首碧云流，十载心情半醉休。画舫红灯檀板月，梦魂何处伴牢愁？”这组诗后收入刻本卷十五，但第三首被删除，为了避免前后矛盾，诗题也被修改为《和童梧冈无题三首》。

在删定过程中，毕沅也难免会偶有疏漏，乍读之下会令人困惑难解，但通过和批点本对照，就能发现个中原委。例如刻本卷三十九有《云涛表弟谒予武昌节院，出其世传〈清溪草堂重台桂〉画卷索题。抚今追昔，不胜风木人琴之感。因成绝句五章，聊写先世之情好，伫盼后起之重荣，亦风人长言不足之义。至诗字之工拙，不及再计矣》一诗，虽然诗题中明确提到“因成绝句五章”，但在刻本中实际存诗仅为四首，颇有名实不符之嫌。而在杏雨草堂本中录有这组诗，共计五首，其三云：“古桂如云绿影低，先慈曾此掩重闺。儿时常话平泉事，每到花时句屡题。（原注：天香书屋，余母初居于此，即开重台桂花处也。）”恰可补刻本之阙漏。究其原因，当是毕沅昔日删去此首之后，一时疏忽，未将诗题随之一并修改，以致诗题与内容未能契合。

二

如前所述，从王文治批阅毕沅诗集稿本到毕沅晚年删订诗集，前后相距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毕沅对诗作修订不辍，屡有增损。因此，若将现存的两种批点本与后来的刻本详加校核，就会对其创作经历和修订情况有更为真切的认识。批点本一方面保留了不少后来被刊落的诗人自注、自序，可供考察其当时的创作经历；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大量和刊本不同的异文，从中可见其推敲斟酌时的细致严谨。

诗人在创作时写下的一些自注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保留很多重要的信息，为

^① 现存毕沅联句诗尚有《寿王述庵臬使六十联句》（见王昶辑《湖海诗传》卷二十二）及《秋日喜竹屿先生至大梁弇山夫子招集嵩阳吟馆联句并寄述庵先生即用其送行诗韵》（见王复《晚晴轩稿》卷五），均未收入《乐游联唱集》中。

我们了解其创作时的原初面貌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仅以青箱书屋本为例，其中所录《闻蛩》（见刻本卷二十二）题下有小注云：“六月十六日。次日立秋。”又《七夕寄月尊》（见刻本卷三十，“月尊”改作“琴心”）“今夕天孙停翠辇，好祈长寿锡慈闱”句下有小注云：“时太夫人抱恙初愈。”又《题月尊倚梅图》（见刻本卷三十一，“月尊”改作“琴心”）“新图粉本重商確，玉井曾摹十丈莲”句下有小注云：“月尊昨游华岳甫归，意欲绘陟华图也。”这些注文在刻本中被悉数删落，其中原委颇难推究。或许在诗人看来此类小注无关宏旨而略显琐碎，但对读者了解诗人创作的时间、动机、本事而言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作品的自序对于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青箱书屋本《送姜杏村同年之官蜀中十首》题下有自序云：

癸未小春之月，杏村明府出宰剑南。廿年旧雨，一旦分携。酌酒宵分，潸焉话别。回忆金台把臂，芸谱联名。喜丹桂之同攀，幸芳兰之结契。陆机献赋，正当入洛之年；王粲怀归，遂有登楼之作。嗣后鳞羽阻修，萍篷飘泊。君则吴根越角，去访庭闱；我则药省梧垣，久羁供奉。嗟故人之远别，欣日下之重逢。复订盟言，更饶狂态。邀酒人于燕市，共载壶尊；结吟社于京华，重联裙屐。红牙按拍，则处处征歌；白练挥毫，则时时留句。于时知己二三，缠头百万。西园小部，郑樱桃色艺俱佳；南国新词，和学士风情不减。无如别易会难，星离雨散。秋风袅袅，愁深公子之行；暮雨潇潇，肠断吴娘之曲。未觉扬州之梦，红粉青楼；重寻茂苑之游，银灯画舫。已而郑虔竟作广文，潘岳旋膺花县。计偕北上，剖竹西行。奏风笛之凄清，怅仙鬼之缥缈。日者寒漏沉沉，离情黯黯。明灯相对，旧人则惟有何戡；落月相思，远道则空悲杜甫。篷艤停棹，双江之春雪初消；剑栈盘云，三峡之清猿不断。到得金花桥畔，回首难堪；他年听雨楼头，对床何日？因成短句，用写中肠，即当《折柳》之篇，聊比《竹枝》之唱云尔。

此诗后见收于刻本卷十六，而这一大段自序却被删除殆尽。毕沅有《书听雨楼图后》一文，提及在京城时曾与诸多师友“比邻而居，望衡对宇，联为吟社”^①，与上引序文对读，足见当日诗酒酬唱之盛。王文治也是诗社的成员之一，故于序中“到得金花桥畔，回首难堪；他年听雨楼头，对床何日？”数句加圈，并借用李商隐的诗句批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显然是因忆及往事而感慨系之。毕沅删去此注的动机不明，个中原委费人思量，但此序文对于了解其生平交游及创作本事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除了删除一些自注、自序之外，毕沅还对旧作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修改，具体情况相当复杂。有不少修改，可以确定是遵照了王文治的意见或是受其启发而来。例如青箱书屋本录有《寄友人塞上四首》，王氏批云：“此题或当另制，以

^① 毕沅《书听雨楼图后》，载沈萃芬、黄人《国朝文汇》乙集卷三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5册影印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深隐为佳。”认为题旨过于显豁浅露，不够含蓄深隐。在刻本卷二十中收录这组诗时，毕沅就改题为《题扇有寄四首》，较原题更为隽永，显然是接受了王文治的意见。又如青箱书屋本《后梅花十首并序》其二：“十年空如云踪杳。”王氏批云：“‘如’字误。”认为“如”字置于此处有误。刻本卷二十三收录此诗时便将此句改正为“十年空谷云踪杳”。再如青箱书屋本《遣兴》其二：“偶来花径游，须臾客迭至。因就松竹阴，石上陈弈戏。文士忽英雄，喜有用武地。居然一枰间，东帝与西帝。此怀囊括心，彼蓄席卷志。”王文治在“东帝与西帝”句旁施以圈点，并批云：“此句另换为佳。”认为此句置于诗中不妥，建议毕沅另作修改。这组诗后收于刻本卷十四（改题为《寓园遣兴四首同云松作》），“东帝与西帝”三句索性全被删除，而代之以“各怀席卷志”一句，显得更为简练精警。毕沅无疑是受到了王文治的启发，才对旧作加以删改修订的。

在杏雨草堂本中也不乏此类例证，如其中所录《题兰庆长夏读书图》开篇云：“书堂畅南荣，乔木阴四野。中有老经师，正襟若垂钓。童子侍坐隅，横经甚年少。双瞳翦秋水，鹤骨颇戌峭……”王氏批云：“‘野’字未详通韵否？”通韵即邻韵通押，由于韵宽，作者便可少受拘束。不过在创作时当依循古人成例，不能任意为之。“野”字属麻部，“钓”、“少”、“峭”等字属萧部，两者并不能相通，用“野”字有出韵之嫌。此诗后收入刻本卷三十二，毕沅便将“野”字改为属于萧部的“罩”字。

诗人创作时有自己的初衷，修改时也有自己的主见，因而毕沅有时也并不完全依从王文治的意见来进行修改。例如杏雨草堂本《环香吟阁遣怀》中两联云：“自改新诗编甲子，偶膺旧疾遭庚申。春山北苑虚中景，秋水南华悟后因。”王氏批云：“微嫌‘甲子’‘庚申’、‘南华’‘北苑’皆前人已经对过之句。”认为其对仗稍显熟套。按谢榛《四溟诗话》云：“许用晦、释清塞皆以‘甲子’‘庚申’为的对，予病其粗直，且非正格。”^①被谢榛诟病的以“甲子”、“庚申”、“南华”、“北苑”为对的情况在明清诗作中屡见不鲜，如唐时升《紫筠居十首》其五：“案上南华秋水，屏间北苑晓山。”^②傅维麟《即事偶成》：“寄兴南华秋水句，醒眸北苑暮山图。”^③陈文述《过周澹岩泰秋水堂》：“画本居然摹北苑，仙书只合诵南华。”^④足证王文治所言不虚。刻本第二十八卷收入此诗时，毕沅将此数句改为“自改新诗编甲子，偶膺旧疾遭庚申。潇湘北苑虚中景，笠屐东坡幻里身”，后一联虽然已按照王文治的意见有所改动，但前一联除改动一字外其余还是一仍其旧。

有时毕沅还会固执己见，毫不退让。例如青箱书屋本《景泰废陵》有句云：

①李庆立、孙慎之《诗家直说笺注》卷四，齐鲁书社，1987年，第421页。

②唐时升《三易集》卷六，明崇祯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此诗后又被钱谦益选入《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三上。

③傅维麟《四思堂文集》卷八，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④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八，清嘉庆二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然其奠定功，千古不可易。”王氏批云：“‘然’字有散文气，须易一字，方入诗格。”认为“然”字有碍诗格，应予修改。但刻本卷十八录此诗时并无任何改动。又青箱书屋本《行馆与蓬心夜话三用前韵》颔联云：“主贤聊为留三宿，兄事应知长十年。”王批云：“第四应添注云：蓬心今年七十。”刻本卷三十八收录此诗时也并未照办。又杏雨草堂本有《宿花庄戏同行者》，王批云：“可弗存否？”建议毕沅将此诗删去，但刻本仍将此诗收入卷二十一，显然对王文治的意见并不以为然。

即便是王文治称赏不已的诗句，毕沅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进行润色修改。例如青箱书屋本《题董东山师所藏郭河阳关山行旅图》开篇有“笑予慷慨有大志，妻子田庐那注意。年年行旅绘为图，聊代生平作游记”四句，王批称赞说：“起势峻嶒，疑从天降。”刻本卷二十收录此诗时，却将这四句删去，而代之以“书生本无经世志，奇服远游快幽意。袖底常携五岳图，偶向人间作游戏”四句。显然毕沅在修改旧作时有自己的考虑，并不因为得到友人的赞誉，就放弃了精益求精的追求。

除了上述这一类与王文治相关的修改之外，批点本还保存了大量异文，可供考察毕沅修改诗作的具体过程。全面检讨其修改情况，自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只能选取数例，以窥其一斑。

有时虽然只是个别字词的修改，改动后的诗意却有较大的变化。例如青箱书屋本《归次凤阳马上题寄在京诸友》云：“数声牧笛烟村晚，新月云端玉一钩。”刻本卷二十一收入此诗时改题为《晓行滁州道中题句寄都中旧友》，又将“晚”改作“晓”，又将“新”改作“残”。“晚”和“晓”时间相反，“新月”和“残月”更是差别极大。同样的情形在杏雨草堂本中也存在，例如该本所录《题陆葵沾先生吴淞归棹图》云：“甫里村，松陵渡，红蓼白蘋春欲暮。”收入刻本后，“春欲暮”被改为“秋欲暮”。有时候虽然诗意图并无多大变化，但从诗艺角度来看，修改之后更臻于完善。例如杏雨草堂本《中酒》有句云：“正是春人新中酒，蛤蜊菰叶梦横塘。”在收入刻本卷十九时便改成了“新病酒”，“病酒”与“中酒”意思相同，但在用字方面却能避免与诗题重复，显得更为妥帖。

有时毕沅会从章法结构、起结承转、叙述铺陈等角度进行考虑，对大段内容加以删改增损。例如青箱书屋本《黑龙潭》云：

红暹逗朝旭，羲和绕危栏。鸟雀不敢近，魂魄愁飞翻。雷霆挟风雨，咫尺波澜间。……龙回人共仰，夭矫空中县。飞章奏朝廷，从此立庙坛。丰碑纪灵迹，万口为夸传。……

刻本卷十四收录此诗，将“鸟雀不敢近，魂魄愁飞翻”、“飞章奏朝廷，从此立庙坛”几句悉数删除，使得全诗结构更为劲健紧凑。又如青箱书屋本《景泰废陵》结尾数句云：

苍然吊荒陵，慨然思曩昔。夷犹下山丘，感喟发胸臆。暝昏落景斜，惨淡西风逼。明月出枯桑，饥鹰叫空碧。

刻本卷十八收入此诗时，将此数句改作“苍茫吊荒陵，夕照来暝色”。原作略显冗长拖沓，经过此番删改之后，戛然收束，意在言外。再如青箱书屋本《重游水木明瑟园》云：

畴昔过名园，胜处失遍览。拟题诗纪游，捉笔仍未敢。今晨重造门，风景不少减。

刻本卷二十一收入此诗，将此数句改为：

少卧研山堂，湖山归一览。名园旧游地，风景不少减，赋拟小长芦，提笔仍未敢。

“砚山堂”即毕沅青年时读书求学的砚山书堂。乾隆十三年春毕沅之父毕镛去世，入秋以后毕沅在母亲的敦促下“复理旧业，勉赴研山书堂”（刻本卷三《感秋九章序》）。“小长芦”指清初诗人朱彝尊，晚年别号“小长芦钓鱼师”，朱彝尊有《水木明瑟园赋》（见《曝书亭集》卷一），传诵一时。显而易见，修订后的定本一改原作的空泛，更能扣紧题意。

在修改某些作品时，毕沅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例如青箱书屋本有《偶作》云：

书签亲整幔亲钩，客里归来拟暂休。落尽碧梧风不定，小窗无处更容秋。

刻本卷二十一有《山居偶作》云：

书签亲整幔亲钩，多谢山灵许暂休。何物安排款归客？万枝香雪一扁舟。

除了首句相同，其馀三句全部改换，当是在修订时以旧作为基础重新写就的。又如青箱书屋本有《道中》云：

初冬柳已髡，策马向郊原。落日未沉岭，孤村早闭门。年丰酒价贱，市远古风存。安得抛尘世，移家筑短辕。

此诗在后来的刻本中并未保留，不过在刻本卷二十一有《句容道上》云：

春深花益丽，锦绣满郊原。酒店藏村坞，茶亭傍寺门。民饶米价贱，市远古风存。一抹栖霞色，遥青出短垣。

两诗相较，前者描写初冬景象，后者刻画暮春风光，并无丝毫关联，却均有“市远古风存”一句，显然是毕沅对原作不甚满意，却又对该句不忍割舍，遂移花接木置入新作之中。

评价一位诗人的文学成就，自然应当尊重作者的意见，以其本人认可的作品定本作为依据。不过有时候其作品的早期传本也保留了定本所无法提供的关键信息，而这些内容对于深入探讨诗人的创作经历和思想转变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所述王文治批点本《灵岩山人诗集》正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文本，通过对批点本的细致考察，可以引导研究者对毕沅创作时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